

錢賓四先生的禮學觀

彭 林^{*}

葉老師、林老師、楊老師、陳老師，還有我們中文系的賴主任，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：

非常榮幸，能夠有機會在這裡就錢賓四先生的禮學觀這樣一個話題，來向大家請教。談這樣一個話題呢，是想通過錢賓四先生對禮學的認識，來反觀今天中國文化的走向，以及我們的責任之所在。大家知道，西學東漸以來，我們中國人一直到今天，始終面臨著一個文化選擇的困難，我們到底是跟著西歐走，還是跟著東歐走？現在好像跟著東歐走這樣一個問題不存在，但是跟著西歐走始終是主流的意見。近代以來有些有志之士，在舉世向西的潮流當中，他們勇敢地站出來，毅然向東。他們的文化立場，是希望以我們的本位文化作為根基，來謀求這個民族的發展。這個文化選擇說來說去，說到根上，是怎麼定義自己的文化，它是應該保留，還是應該被淘汰。

在舉國上下都裹挾在「打倒孔家店」、「禮教殺人」這樣一片喧囂聲當中，也有像梁任公先生這樣持相反立場的學者。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掌故：任公先生和他的一位叫湯覺頓的朋友，兩人都用化名，一位叫滄江，另一位叫明水，在《國風報》上展開辯論。一個說中國很快就要亡，因為那時的中國已經像西瓜一樣，被人家切成很多塊，準備分掉。民族的存亡使我們一些知識份子感到巨大的壓力。梁先生認為，中國絕對不會亡，理由是因為是中國的文化不會亡。這場論戰轟動了整個中國，許許多多的知識青年看了這篇文章之後，走上「救亡圖存」的道路。

錢先生當時只有十幾歲，那麼讀完這篇東西以後，決定自己要從歷史上來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。錢先生晚年時說，自己以下八十年的歷史研究，完全是為這一念所驅使。他堅決反對當時的中國人「震於西化，反所其夏」，亦如邯鄲之學步，非驢非馬，喪失了自己，也學不像他人。他又說，中國的文化精神，需要在一個最高的，或者說更深的層面上來說明，中國文化是什麼？這文化不殆亡在什麼地方？那麼他就非常贊同任公先生的一個意見。他說梁任公以「中國重禮治與西方重法治相對，此可謂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」。任公先生是讀文化的，他沒有再去經營破碎的那樣一些問題上去，比較凸顯文化的；他把中國文化歸納為「禮治」，錢先生非常贊成。

^{*} 中國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。

我們讀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，裡面討論到「禮」的地方非常非常多。今天由於時間關係，主要討論其中三篇集中談「禮」的文章。

第一篇文章是〈禮與法〉。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，是中國政局即將發生重大轉變的時刻，各個政黨、各個階層都在發表自己的政見，希望能夠左右時局的方向。錢先生一生當中，跟政黨、政治是保持距離的；他更感興趣的，是怎麼樣在文化上，為中國社會的未來能夠找到方向。當時他在太湖之濱休養，在這個期間，他把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較的三十個題目分別地寫成了論文。例如〈精神與物質〉、〈藝術與科學〉、〈自由與干涉〉、〈鬥爭與仁慈〉、〈科學與人生〉、〈經驗與思維〉等等。這三十篇論文，後來結集成為《湖上閑思錄》這本書。這些文章寫得非常短小，但是非常深刻。〈禮與法〉這篇文章，從表象到實質，對禮治與法治兩者的得失、優劣，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。

其實禮治與法治，孰優孰劣這個爭論至遲在春秋時候就已出現，治理一個國家是「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」，還是「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，這對我們來講，其實不是新問題。經過秦始皇的暴政，一直到漢代，中國社會做出了正確的選擇，就是反對商鞅、秦始皇式的法治，而選擇了禮治。可是近代以來呢，我們在非常特殊的社會背景之下，認為法治是最好的政治；禮治不僅腐敗，而且殺人、吃人。許許多多人就繪影繪聲跟著捧。錢先生這篇文章，把他自己的思考非常透徹地表達出來，他提出一個問題：中國是一個一大農國，「以一個中央政府統治若大一個國家，應該有一種普遍而公平的法律」，這樣「才能把全國各地攝合在一起。」「而且農業社會比較穩定，不多變動，那一種法律，因而也必得有其持久性以相適應。」所以「中國政治從其客觀要求論，實在最易走上一條法治的道路。」從表面上看來，中國應該是一個法治社會。「然而，中國思想界卻總是歌詠禮治，排擊法治，尤其是儒家可為代表。」

我們選擇了禮治的道路，大家看他其他文章的反覆地講到周公「制禮作樂」開始，中國人就認為這個治國要依據「禮」。那麼好了，下面的這個禮跟法的比較，這是讓我們非常吃驚的。那麼錢先生把很多我們世俗的看法，一條一條地給批評。「禮」是外面像是等級的。現在我們在中國大陸離開封建，都沒辦法，有一些很有身分、很有地位的人一張嘴就是：「這個禮要不得？這是一個等級的，封建等級呀。吃人的、殺人的。」這令人非常的感慨。錢先生講的，這是外面像，表面像，很皮相的看法；其實卻是平等的。我們要把《禮記》這些書好好讀讀，就能認同他的這個解答。「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，其實是等級的。」「禮是導人走向自由的，而法則是束縛限制人的行為的。」這跟我們世俗的看法截然不同。禮是一種社會性的，法則是一種政治性的。禮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內的，而法則是由政府而下行之於社會的。而禮是從社會上來推及於政府。無論如何，「禮必然承認有對方，而且其對對方又多少必有一些敬意的」；而「法則只論法，不論人。殺人者死，

傷人及盜抵罪，那曾來考慮到被罰者。」「禮是私人相互間事，法則是用來統治群眾的。」錢先生一共說了七點。那麼為什麼西方它崇尚法治？中國崇尚禮治？是因為兩種文化的寄託不同。禮治精神，它是要寄放在社會各個人身上。這個禮，通過修身來齊家，通過齊家來治國平天下，這裡面就「保留著各個人之平等與自由」。我們讀《論語》，讀《孟子》，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論述，就是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，「雖負販者」即使是肩挑背負，沿街叫賣的小販，也沒有分別，所以，它趨向一種看起來是鬆弛散慢的局面，那是因為它保留了個人的平等跟自由。「法治精神則要寄放在國家政府，以權力為中心，削弱限制各個人之自由，趨向於一種強力的制裁的」。

對於我們中國來說，選擇禮治的道路，確實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係。「法的重要性，在保護人之權利；而禮之重要性，則在導達人之情感。權利是物質上的，情感是性靈上的。人類相處，不能保衛其各自物質上的權利，固是可憂。然而，不能導達其相互間之情感到一個恰好的地位，尤屬可悲。」權利是對峙的，情感則是交流的。「惟其是對峙的，所以可保衛，也可奪取；惟其是交流的，所以當導，又當融通。因而禮常是軟性的，法則常是硬性的。」所以中國的儒家，他以一個基本的一個邏輯，就是治國說到底是治民，而這個「民」是一個怎麼樣的「民」呢？我們讀《中庸》就可以知道，人有一種「天命之性」，我們在跟外界這個接觸，受到外物刺激，這個「性」能轉化成喜怒哀樂之「情」。「性」是內在的，「情」是外發的。人是一種具有豐富的、細膩的、複雜情感的一種動物。

在商朝的時候，我們的人性，包括我們的生命，得不到尊重。許多人活著的唯一價值，就是有朝一日被牽上祭壇充當犧牲。武王克商以後，民本主義思潮開始勃興。進入西周以後，拿活人殉葬的現象，驟然減少。偶而也有，但是要受到社會的嚴厲譴責，這在《禮記》裏有很多記載。有人就用木頭、拿草來做成人的樣子殉葬，孔子也加以批評：「始作俑者，豈無後乎？」儒家的精神，不僅要尊重人，尊重生命，而且要尊重人的情感，要尊重人的喜怒哀樂。所以《中庸》這一篇在喜怒哀樂未發和已發之間立說。郭店楚簡有八個字說得非常好，這個「禮」是什麼呢？「始者近情」，禮緣情而發，禮是表達情感的，但是這個情感你發出來的時候，要「終者近義」，一個人的情感，必須要是健康的表達，對於他的身心是有益的，對於社會是有益；如果成天是狂躁而暴怒，大喜大悲，那麼他的身心一定會出大問題。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惡性事件，不少屬於「激情犯罪」，一句話不對，一個動作不對，兩個人就惡言相向，甚至拔刀相鬥，釀成悲劇。我們每個人從早到晚都被自己的情感所左右，情感表達得不對，有兩種情況，一種是「過之」，一種是「不及」，理性的，也談不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。儒家的「禮」和「樂」就是要引導人們能夠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情感，要把它引導到一個恰好的地位。人有了健康的情感，交流也才能健康。所以我們自古以來特別重視這個心性，那麼到了宋明理學這時候，把這套學說做大，做到了極致。

如果不瞭解這一點，就不瞭解中國文化。只有瞭解這一點，才知道為什麼中國是一個禮治國家。那麼這個裏面呢，他說得很公允。你有你的好處，但我們也有我們的好處。你們能保衛物質的，我們是注重情感。人是有情感的動物，不是一天到晚只會爭權奪利的動物。要引導社會最終走向和諧，一定要在人的心、性、情這上面挑明，中國人很看重這方面的修為。

好，剛才呢，我們說一下那就是說到的，它是很少很少的站出來，把禮跟法比較，而且認為禮是比法好，不是說至少禮和法是各有千秋。任公先生說，中國是禮治，西方是法治。很遺憾他沒再往上說，或者沒有承以既往。而錢先生呢，在這個地方作了很深入的比較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沒引全文，大家可以找原書來看。

第二篇，是他在香港新亞書院的時候寫的。大家知道，一九四九年，錢先生跑到新亞去了，跑到香港去了。我們今天到香港中文大學，有個錢穆紀念館，大廳牆上大字書寫著錢先生的一段話。他到香港，實際上是仿效朱舜水。明亡以後，朱舜水跑到日本去，要把中國文化的一脈在日本延續下去。後來日本明治維新，有許多日本學者從朱舜水那裏尋找思想資源。那麼，錢先生也決心要存中國文化之一脈於嶺南。怎麼存法呢，他生平最服膺宋儒。宋儒很重要的理念，就是辦書院，為國家培養人才。錢先生平時非常注重士大夫精神。中國社會有「士」這一個階層。這些人不跟政權合作，只在民間傳播中國文化，所以儘管國家的政統在上面不斷地變化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可是中國始終是中國，這是因為由於書院的興起，本位文化在民間有一個非常堅固的基礎。所以蒙古人來也罷，金人來也罷，滿人來也罷，中國始終是中國，文化的血脈始終是延續的。所以，他到香港之後辦新亞書院，這是他人生的一个政治理想。在非常西化的香港辦書院，非常不容易。這個裏面有一些涉及到一些理念上的問題，你辦的學校，跟英國人辦的學校，有什麼不同？區別何在？

《論語》裏有一段話，這段話我們都讀過，但是沒把裏面的味道給讀出來，沒有把它真正讀懂。孔子的學生子路向孔子請教「成人」，我怎樣才能成長為一個完美的人，一個大寫的人，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。孔子的回答非常有意思。他說：你要有「臧武仲之知」，有他的那種聰明；「公綽之不欲」，像他那樣的廉，沒有私慾；有「卞莊子之勇」、「冉求之藝」。這四個東西加在一起，誰能做到？拿我們今天的標準，這就是一個了不得的全才！可是孔子認為這還不夠，還要「文之以禮樂」，要加上禮樂，你才稱得上是一個完人。朱熹解釋說，成人，猶言「全人」。「武仲，魯大夫，名紇。莊子，魯卞邑大夫。言兼此四子之長」，這四個人的長處都集於你一身，「則知足以窮理，廉足以養心，勇足以力行，藝足以泛應」這是何等的了得。但是還不夠，還要「節之以禮」，「和之以樂」。你的一言一行發而皆中節，這「禮」就是合於道德理性的節文。其實好多人很有知識、很有學問，可是

一舉一動讓你覺得不舒服。你讀《禮記》：「和之以禮樂」，「樂」是自心的。《禮記·樂記》、郭店楚簡，類似的用辭太多。「德成於內」，「文見乎外」，這「材全德備，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跡；中正和樂，粹然無複偏倚駁雜之蔽，而其為人也亦成矣。」你就成為了一名真正意義上的人。尤其可貴的，錢先生把對這段話的理解，變成新亞辦學的理念。在新亞新校舍落成典禮上，錢先生引了《論語》的這段話來加以發揮。

孔子理想中之完人，須於技能、智慧、德行之上，更有禮樂一項。「惟有禮樂人生，始是經過文化教育文化陶冶的人生中之最高境界。」試問：無論是臺灣還是大陸，有哪一所學校把禮樂作為培養人才的一個最高境界？只有新亞。「禮樂，非技能，非智慧，亦非品德。乃在三者之上，而亦在三者之內。若使人類日常生活沒有了禮樂，縱使各人都具備才藝、智慧和品德，仍不理想」，不完美。「未經禮樂陶冶的個人，不得為成人。」不是說十八歲就是成人。「無禮樂的社會，將是一個不安定的社會；無禮樂的天下，這是一個不安的天下。」大家好好咀嚼咀嚼，先從我們自己身上開始，你懂禮不懂禮？你懂樂不懂樂？樂對於你生命的意義在於什麼地方，你想明白沒？

錢先生把禮樂是結合新亞教育所有目標的最高理念。「我們學校，一向提倡中國傳統文化，一向重視人生最高哲理之探究與實踐，一向鼓勵同學們自主自發地團體活動。」不是沒有個人自由，禮是讓你有真正的自由。但是，「結合此三者，而求揭示出一項統一原則，我想首舉『禮樂』二字。」這段話，只有與中國文化、人格學說，有很深入研究和思考，才說得出來。他提出了「禮樂性情」的理念，認為「禮是一種節制心，樂是一種和順心。」一個人要節制自己的性情與言行，樂是一種和順心，由於時間的關係，這裏不能展開來討論。「由於有此節制與和順的心情的內涵，而始引生出禮樂。鐘鼓玉帛，則只是表現此類心情之工具，而非其本真。」我們捫心自問，我們是一個和順的人嗎？是一個懂得節制的人嗎？離開了本體來談，就是虛談，沒有意義。

那麼，人為什麼要自我節制呢？現在大家都講個體、講自由、講個人意志；似乎天經地義，但是人是一種群體的動物。人在群體當中生活，如果每一個人都不能節制自己，人都好張揚個性，那麼麻煩和衝突就會不斷。所以，我們在群體當中生活，必須要考慮到對方的存在，並且要多少懷有敬意，這樣就一定要節制自己顧及他人的感受。「己安而群亦安」。如果各不節制，互不合順，這個「群不安而己亦不安」。所以，通過人人學習禮樂，來達到社會的和順。而西方「憑法律來束縛人、管轄人」。就像法家他心中也知道要有「群」，但不知道群中仍當有人，即個人的存在。他只是知道群性，沒有個性，人也不能安，群也不能安。錢先生對法家的這個評說，說得也是非常中肯。

我們人人都知道一句話，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」立要立在禮樂上，立在自己心有節制能和順上。那麼不僅要從意義上、從字義上來理解節制與和順，還應該從我們每個人的群

體生活當中來體認各種的內心，如何是節制，如何是和順。我們要考慮我們的整體的利益，整體的和諧。中國文化不是宗教文化，人的靈魂要靠自己掌控，這要透過禮樂來完成自我節制。我們很多人，賴此群而生，是依靠著這個群體，依靠著這個社會的創造、集體的力量而生存的，但是他的心不屬於此群體。在他的內心不認此群和他是一體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此人若果誠是人，則只得稱為一個人」，他跟我們的群體沒有關係，他沒有融入到這個社群，或者這個集體當中。錢先生又說，如果說有大眾的個人，各為本身功利起見，在此群中鬥爭奪取，那麼這個群只是一堆物。它是一堆物，裏面的大眾、個人也都是一堆物。物跟物相爭，縱使有組織，相互間也只是各為工具，終難也終難於和平共存。儒家講究「長治久安」，這個理想一代達不到，我們兩代，兩代達不到，我們總是不斷地要逼近這一個目標，而禮就是一個通往和諧的不二法門。

錢先生還講到，人類是萬物的靈長，即高於萬物之上的。所以人自身應該有一些和他物不同的東西。我們與禽獸最大的不同是什麼？是我們有「禮樂」跟「明誠」。錢先生說：「禮樂人生可以救此世，亦只有禮樂人生可以救此世。在禮樂中生活的人，自具有明誠之德。具有明誠之德，自可進入禮樂人生。」非常可惜，新亞以外，我們大學教育的理念幾乎都達不到這一層面，許多大學還是停留在培養技術人才，技術工具性人才的層次上。

錢先生指出，道家也講節制跟和順，比如不少人練氣功，也知道這個不能吃，那個不能吃，要自我節制，心要靜下來，似乎裡面也有和順這種東西。錢先生說，這是不同的，道家「忽視群體生活，他們想能遠避或脫離此群體生活。」他們可以到一個山洞裏面壁十年，求個人長生；這個社會泰山崩、黃河溢，我祇當聽到。道家通過脫離群體，來保持吾心之節制與和順。他們認為，群體生活是導致人心無節制、不和順的主因。所以他們想追回「一種隱避的、孤獨的，乃至山林的生活，甚至是一種遠古的、原始的、自然的生活。」希望這個群體的範圍愈縮小愈好。道家思想之矛盾在於「想違逆自然來崇重自然」。這話說得非常的深刻。我們的「禮樂人生」，是不脫離社會的。在這個社會當中，我們來求得自己的節制與和順，最終達到社會的節制與和順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只能點到為止，不展開講了。

最後要說到的，是錢先生談禮和俗的文章。我到臺灣來，幾次去看過外雙溪的素書樓。錢先生六五年來到臺北以後，接待過一個耶魯的教授，名叫鄧爾麟。鄧爾麟向他請教：「什麼是中國文化？」錢先生高屋建瓴地給他作了介紹。後來這位美國學者把這篇談話整理成一篇文字，叫〈一堂中國文化課〉。錢先生裏面講的東西，我感到振聾發聵。錢先生講到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不同，及其不同的原因。他說，西方文化是小國寡民的。我們看歐洲地圖，有個叫作摩納哥的，非常之小，我都很擔心這個地方能不能舉行足球比賽，可能一腳就把球踢到外國去了。這當然是開玩笑。我們中國幾千年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可

是它總體上還是合的。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西方文化缺少一個層面，什麼層面？就是「禮」。西方人是按照方言跟風俗，來劃分國家的。方言不同，風俗不同，就是一個國家。那麼在中國呢，不管你是哪裏來，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。文化是宇宙性的；鄉俗、風情、方言只代表一個地區。廣東人跟東北人，說話可以聽不懂。浙江人過節跟甘肅人過節，風俗可以完全不同。但是我們在「禮」這個層面上，是彼此認同的。

錢先生這篇文章一開頭就說道，中國文化可以歸結為一個字，這個字就叫作「禮」。「禮」這個字，在西方語言裏面沒有同義詞可以翻譯。中國人講的「禮」，相當於西方人說的「文化」。禮是無所不包的，無論什麼東西都是禮。儒家的政治理想：「天下為公」的大同世界，它的理論表述是在《禮記》的《禮運》篇裏。人跟自然怎麼相處，怎麼保護自然、保護動物？這也是禮，它以具體制度記載於《禮記》的〈月令〉。人跟人之間是禮，個人修身還是禮。正因為西方語言中沒有「禮」這個層面，「它只用風俗的差異來區分文化，似乎文化只是其影響所及地區各種風俗習慣的總和。但是，如果你要了解中國各地的風俗，你就發現各地風俗差異很大。」錢先生以他家鄉為例，這個鄉和旁邊一個鄉，風俗都不一樣。「十里不同風，百里不同俗。」如果按照風俗去劃分國家，那還得了，那我們不知劃分為多少國家。廣東省光大的語言就有三種。然而無論在哪裡，禮是一樣的。「『禮』是一個家庭的準則，管理著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務和外事。」「『禮』也是一個政府的準則，統轄著一切內務和外交」等等，「要理解中國文化非如此不可，因為中國文化不同於風俗習慣。」錢先生把為什麼中國文化不是小國寡民的，或者說為什麼西方是小國寡民的，說得很清楚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講地理、山川、人情，還講到各個地方的風俗。現在我用錢先生的兩句話來作總結：「西方語言中沒有『禮』的同義詞。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裡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，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。中國人之所以成為民族，因為『禮』為全中國人民樹立了社會關係準則。要瞭解中國文化，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。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『禮』。」離開「禮」來談中國文化，就是空談。另一句話是：「諸位要知，中國政治是一個禮治主義的。」倘使我們說它(西方)是法治的，最高是法律；那麼就是禮。那麼，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須禮。禮之和合範圍大，故中國人極重禮。」我想，在近代學者當中，像錢先生這樣，在一個這麼高的層面上來闡發「禮」與中國文化的，可謂是絕無僅有。好，謝謝大家！

